

世纪末的回眸

● 王科著



世纪末的回眸

——现当代小说研究

王 科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 145 号

燕赵文学书系(二)

世纪末的回眸

王科著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安外六铺炕）

印 刷：石家庄市矿区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8.5

数 字：221 千字

印 数：1—2000 册

版 次：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08—1745—2/I · 453

定 价：10.00 元

- (08) 亂世也難逃小畜吉臨當山，蕭何神
訖天降詩文大作——歷史是詩者列世，據小畜卦臨
《詩經》之《小畜》詩文，其詩作半數採用——
(09) 爭鮮鬥麗——先秦詩王的詩我
一章《五經》詩文——詩歌詩歌歌聲歌——
(10) 仁愛可遇不可求——李叔同詩歌《悲歌》序言
(11) 亂世三橫——列國詩歌悲歌中讀詩歌小的詩歌詩
在小畜廟少的歌謡之間——不捨方志伊歌詠矣長——(12)

目 录

- (11) 想念王水照思想文字——詩詞——
 “国人魂灵”的艺术载体 (1)
 ——论阿 Q
 关于《伤逝》思想和艺术的破译 (7)
 面对苦难和绝望的世界 (12)
 ——《家》的面面观
 在倾斜的历史平面上 (17)
 ——《子夜》的人物与艺术
 反顾：悲怆的都市之魂 (23)
 ——《骆驼祥子》的深层意蕴
 萧军创作风格论 (28)
 历史小说创作的“旧”超越 (39)
 ——《论吴越春秋史话》
 论萧军的《五月的矿山》 (45)
 植根在辽西沃土上的农民歌者 (56)
 ——李惠文论

世纪末的回眸

韩汝诚：出色的蒙古族小说家.....	(66)
他赋予小说：当代性与历史感.....	(77)
——漫论赵大年的创作	
升华生活的美质.....	(90)
——论金河的小说创作	
关于孙春平小说创作的纵向思考.....	(101)
在传统的小说创造中辐射当代意识.....	(109)
——评吴秀春的小说创作	
一曲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赞歌.....	(114)
——《红岩》的艺术视界	
论王蒙的《活动变人形》.....	(123)
浓墨重彩绘苍生.....	(135)
——论浩然的《苍生》	
独具特色的辽西农村风俗画.....	(144)
评李惠文的《乱世夫妻》、《莫测姻缘》	
荡气回肠的人生鸣奏曲.....	(156)
——读张承志的《黑骏马》	
大河天来 雄风万里.....	(165)
——论《北方的河》	
高亢的中年颂 燃烧的爱国情.....	(173)
——评《有意无意之间》	
《高山下的花环》艺术谈.....	(183)
《小鲍庄》：民族自审力的聚焦.....	(191)
《爸爸》的美学观照.....	(199)
在矛盾对立中锻造人物性格.....	(208)

——《船过青浪滩》创作技法摭谈	
记忆的窗口向人生洞开.....	(214)
——《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赏析二题	
彩虹，正在前方闪光.....	(221)
——读《虹》	
社会历史文化的深沉积淀.....	(227)
——《西三旗》二人谈	
在小说潮汐的涨落之间.....	(232)
——《锦州文艺》一九八一年小说掠影	
新写实，亟待超越的小说艺术.....	(239)
——关于新写实小说及其评论的反思	
企盼回答：面对创作的挑战.....	(249)
——《当代满族短篇小说选》编后札记	
腾跃在当代满族文学的风景线上.....	(257)
——李惠文、孙春平漫议	
“昼梦”，还应该继续下去.....	(263)
——就《昼梦》致朋友书	
后记.....	(267)

“国人魂灵”的艺术载体

——论阿Q

在谈到《阿Q正传》的成因时，鲁迅先生说过，我“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诚如斯言，阿Q这个不朽的典型，确是“国人魂灵”的艺术载体。这里，我们试作一般性的剖析。

《阿Q正传》的巨大历史容量，深刻的思想内涵，以及鲁迅对于国民性的理解，都熔铸在阿Q的形象中，显然，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典型。

阿Q的社会经济地位十分低下，物质生活条件极其匮乏。他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孑然一身，借住于土谷祠。无固定职业，在乡间干些临时农活，以苟延残喘。生活既无保障，又无任何个人权利，终至失业挨饿，沦为“不敢再偷的偷儿”，最后在革命中糊里糊涂地做了“惩一儆百”的牺牲品，结束了悲惨的一生。这说明，阿Q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村流浪雇农，最后竟堕落成为流氓无产者。

在阿Q身上，确有作为一个劳动农民的一般思想性格，但它不是单向的，其思想行为呈现着颇为复杂的状态。作为一个毕生受着压迫的农民，阿Q很能劳动，既质朴又愚蠢；因为失去土地，无固定职业，四处流浪，具有流氓无产者的狡猾甚至还有某些近于无赖的行径；同他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地位相联系，他有对统治者本能的对立意识，但没有阶级觉悟，竟想攀附权势以改善自己的处境；他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有许多不合未庄“老例”的事物，反过来他又耻笑乡下人不见世面；他长期受封建思想禁锢，排斥异端，盲目正统，讲究“男女之大防”；在一定条件下又要造反，很有些出格。阿Q思想行为的这些特点，可以认为正是“农民式的质朴、愚蠢”和“游手之徒的狡猾”，这一性格的主要特征混杂扭结的各种表现形态。这和闰土那样老实、淳朴的农民很不一样，但对于一个生活在象未庄那样封建闭塞充满落后意识的农村社会里，没有觉悟的落后流浪雇农来说，还是不难理解、不足为奇的。

阿Q性格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精神胜利法”，它是阿Q思想行为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也是小说艺术刻画的重点。这种精神胜利的主要表现即：阿Q的客观现实境遇，处处失败，十分悲惨，而在他的主观幻想世界里却“常处优胜”，自我满足；他的一生本是一本奴隶血泪帐，而在他的主观世界里，却是一部得意的英雄胜利史。

阿Q对自己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处境原是不满的，但他不能正视它，不能进行切实的反抗斗争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往往以一种虚妄的臆想来安慰自己，在幻想中求胜利。阿Q没有妻室，不详姓氏，“行状”更茫然，可是当和别人口角的时候，则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什么东西！”看见赵太

爷儿子中了秀才，也称自己姓赵。赵太爷不准他姓赵，骂他、打他，对于这样的凌辱，阿Q原是“忿忿的”，但后来又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以至“忽而想到赵太爷的威风，而现在是他的儿子了，便自己也渐渐地得意起来，爬起身，唱着《小孤孀上坟》到酒店去”，于是原来的“忿忿”化为怡然自得了。就这样，明明是现实的压迫和凌辱，却被什么“先前阔”、“儿子打老子”等臆想所掩盖。

阿Q的“精神胜利法”，表现在许多方面。阿Q很自尊，讨厌头上的癞疮疤，感到不光彩，就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癞”的音，以至连“光”、“亮”、“灯烛”都讳，当别人还是进行嘲弄时，他又以“你还不配”来自傲了。对别人的擦逗、侮辱，他原是要反抗的：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便骂，气力小的便打，结果，总是自己吃亏的时候多，最后只好采取“怒目主义”了。气力大者瞪眼睛，会使人望而生畏，但瘦骨伶仃如阿Q者，眼睛瞪裂了，也不过是虚张声势，只能令人感到滑稽，毫不足惧的。因而别人还是撩，终而至于打，揪住辫子碰响头。这时他还会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他用“总算被儿子打了”来自欺，又用“我是虫豸”来讨饶，这时候他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又以这“第一个”来自慰了。遇到“精神胜利法”无能为力，实在痛苦不过的时候，就自打嘴巴，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人一般，又心满意足地得胜了；受辱或失败之后，会向比自己更无力的人去泄愤，在看客们无聊的喝彩声中，得到了满足。还有健忘——忘却受辱和痛苦——实际是极度的麻木；被捕、受审，以至杀头，对于这样人生之大痛，他想的是“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不免要抓进抓出，未免要杀头的”；他为圆圈画得不圆而遗憾，想到“孙子才画得圆哩”就安

然了：当游街示众，即将枪毙的时候，还要喊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

阿Q所以如此浑浑噩噩，只能以精神胜利来自我安慰，是同他生活的社会环境和自身的具体情况密切相关的。如作品所写，阿Q生活的未庄，是一个没有理性，劳动人民没有任何个人权利的社会。封建专制主义残酷、强暴而无人性的剥削和统治造成了农民的极端穷苦和愚昧落后。阿Q生活在这种社会的最底层，一贫如洗，无权无势，不过是一个会说话的工具。在阿Q的生活历程中，我们看到，他对于恶劣的处境，虽曾图谋改善，但总是以失败而告终。阿Q在封建主义种种残暴的剥削和压迫下，找不到任何出路，只好“借助于精神的方式”——精神胜利法，“以求得解决或满足”，这是一个没有觉悟的愚弱的奴隶无可奈何的抉择。这结果只能是恶性循环，愈陷愈深，终于成为一个不死不活、浑浑噩噩、徒供役使和榨取的奴隶。作品通过喜剧性情节，用嘲讽和戏谑的笔调，描写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表示了对它的批判和否定。

鲁迅说过，他写《阿Q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①，“是想通过阿Q的形象指出各种各样的坏习惯和坏脾气来；阿Q是个坏脾气多的典型人物。”^②阿Q许多“坏习惯和坏脾气”，特别是精神胜利法，确实是国民性的弱点。这种社会精神特征是特定历史和社会的产物。农业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历史上屡遭异族入侵和近代史上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儒家为首的传统文化思想消极因素影响等等，这些经济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多方面的原因，不只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停滞、闭塞、

^①《伪自由书·再谈保留》

^②许钦文：《〈呐喊〉分析·阿Q正传》。

日趋没落，而且造成了人们目光短浅、狭隘、保守卑屈、奴性、随遇而安、逆来顺受等等思想上精神上的病症。在阿Q性格中，显然熔铸了这些较为普遍的国民性弱点和社会精神病症。

小说关于阿Q革命中的思想行为及其革命结局的描写，进一步揭示了阿Q的性格特点，同样显示了作品锋利的批判性。

阿Q在陷于“末路”的时候，迎来了革命。阿Q性格在革命中是有变化的。在对待革命的认识上，阿Q原本持有排斥异端的正统观念，“以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但是当革命真的到来，他从现实中亲眼看到革命“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未庄的人们又如此“慌张”，他就有些“神往”而且“快意”，并进而决定“投降革命党”。

但是，阿Q的“革命”始终是浑浑噩噩的。他盘起辫子就自以为成了革命党；胡胡涂涂地找假洋鬼子去投革命党，专横得只许自己“革命”，不准小D革命，而对革命的追求不过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他的革命观念和追求，在他那段“革命畅想曲”中有着活生生的体现。这里可以说有值得肯定的想用革命暴力对反革命进行应有的惩治，有想通过革命改善生活处境的合理因素，但是从根本上看，他没有政治觉悟，不知道因何失业和挨饿，分不清敌我友，不知道应该联合谁，打击谁，他把小D和赵太爷一样看成是自己的头号敌人，把王胡和赵秀才、假洋鬼子等量齐观，更没有明确的进步的政治要求，只是想获得权势，抢得财物，再就是不能忘怀于女人。所以他虽然曾在革命的实际感受中，摆脱了传统思想的束缚，但是当他受到“不准革命”的打击以后，又戴上了传统思想的枷锁，说什么“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啊，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

满门抄斩……”事实上恰恰是他自己被“抓进县里去杀头”，成了至死不知其冤的冤魂了。

阿Q这样一个毕生受着压迫，且贫困不堪的劳动者，从改革自己生活命运的迫切要求去迎接革命，这是应该肯定，值得同情的。特别是最后竟被假革命的反革命送上了断头台，落得一个“大团圆”的下场，白白做了牺牲，更是令人愤慨的。然而对于阿Q式的革命，鲁迅是否定的，并给予了无情的嘲讽。作品通过阿Q革命的描写，说明赵秀才、假洋鬼子之类是假革命的反革命，一定要警惕，要戳穿，要打倒，但和他们处于对立地位的阿Q那样的革命，也是要不得的。这是鲁迅至为切痛的感受，至为深邃的思考。

总之，《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时期农村社会为背景，通过阿Q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和辛亥革命中悲惨命运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农村社会的现实，无情地揭露了封建主义统治的罪恶；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剖析了人民群众精神上的残疾，并进行了凝结着血和泪的批判。它是旧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缩影，是劳动人民命运的深刻写照，是辛亥革命的历史总结。

阿Q，国人一面不可或缺的镜子！

阿Q，华夏大地上驱不走的幽灵！

关于《伤逝》思想和艺术的破译

《伤逝》是鲁迅唯一以爱情婚恋为题材的小说。

何谓“伤逝”？“伤逝”一语出自《世说新语》。“伤”者，悼也，“逝”者，亡也。缘此解读，《伤逝》乃是一曲“美”的挽歌，是令人心悸的心灵独语，是声讨旧思想、旧礼教的檄文！这样，我们就不能仅仅将其看作是一般的婚恋小说了。

让我们从人物、思想、艺术的角度，来探索《伤逝》的底蕴。

主人公涓生和子君，都是二十年代初期具有某种程度民主思想的知识青年。他们经常在一起“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由志同道合到产生爱情。涓生是子君的思想启蒙者，但子君的思想却比涓生“透彻，坚强得多”。在强大而顽固的封建势力和世俗偏见面前，她勇敢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正是在这种共同的思想基础上，他们毅然冲出了封建家庭的樊篱，热恋同居。但是他们为了争取婚姻自由的个性解放思想，毕

竟属于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范畴。他们的斗争只是为了个人的爱情，缺少更高的理想和目标，因此一经同居便别无所求了。子君不再读书，不再思索问题，她的幸福沉浸于对过去“求爱”的一幕的回顾，她的乐趣也转移到喂小鸡、小狗之中。这使涓生不满，爱情之花渐渐褪色。涓生对婚后的生活比较清醒，认识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否则，“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但是，爱情怎样才能更新、生长、创造？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要开辟什么样的生路？他自己并不很清楚。他笃信易卜生的“真实纯粹为我主义”，先把婚后爱情生活的褪色全部责任归咎于子君，遭到失业打击、生活难以为继的时候，又把子君看作是自己的累赘，认为“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甚至“突然想到她的死”，以至有一天他终于向子君说出“我已经不爱你了”这样轻率的不负道德责任的话。子君是一个勇敢的反封建的女子，但她的思想也存在两大弱点：一是反封建还不彻底，仍把封建的“女子治内”的礼俗视为当然，靠丈夫养活，实质上是冲出了一个牢笼又陷进了另一个牢笼，并未取得真正的解放；二是子君带有浓重的爱情至上主义的色彩，涓生说不爱她了，她的精神就完全崩溃了，于是回娘家之后，“负着虚空的重担”，很快地就死于无爱的人间。涓生在子君死后，又回到原来寄住的会馆。这时，他才悔恨交集，痛不欲生。然而，已经晚了！

《伤逝》是一篇具有非凡思想深度的小说。它比当时其他作家同类题材的作品有两个重大突破，第一，它把描写的重点，不象一般爱情小说那样放在诉说封建社会制度下婚姻不自由的痛苦，或表现青年们在个性解放思想的鼓舞下，为争取婚姻恋爱自由与封建传统偏见所作的斗争上；而是放在子君涓生结合以后的悲惨遭遇上。这突出地表现了《伤逝》思想的深刻性，那些一般

关于《伤逝》思想和艺术的破译

描写爱情作品的终点，只是它的起点。第二，它不仅批判了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封建势力的压迫，其中包括谈恋爱时遭到种种的反对和敌视，婚后局长下的免职令，断绝了小家庭的生活来源，还有子君回家以后受到父亲烈日一般的威严和旁人赛过冰霜的冷眼，把她折磨得年轻夭折；而且通过子君和涓生婚后生活的细致描写，深入揭示了造成悲剧的思想根源：个性解放思想使子君勇敢地冲出封建家庭而和涓生自由恋爱结婚，但也正是单纯的个性解放思想，使他们在社会压力下离异而酿成悲剧。他们婚后的不得不离异，社会的压力只是外因，而两人思想裂痕的不断加深，则是更为本质的内因。这之中，有子君所表现的肤浅的个性解放思想——“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她不知道“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更有涓生所表现的极端的个性解放思想——易卜生的“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具有这种思想的人，“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重要，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象海上撞沉了的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胡适：《易卜生主义》）于是，当爱情的小舟遇到狂风恶浪时，涓生想到的是“救出自己”，连爱人子君也不顾了。所以，《伤逝》是封建社会、封建家庭、封建礼教和传统偏见一手制造的社会悲剧，也是由单纯的个性解放思想所酿成的性格悲剧。鲁迅在《伤逝》里对封建势力和单纯的个性解放思想进行了同样深刻的批判，在今天仍有巨大的教育意义。

《伤逝》在鲁迅小说中是别具一格的，有极高的艺术成就。

首先是浓烈的抒情气氛。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说过：“如果说在《阿Q正传》中，鲁迅是一个表面上好像是无情叙述事件的叙事作者，那么，在《伤逝》中他就是一个拨动心弦的深刻的

抒情作家。”这是十分准确的评价。它通篇用散文诗般优美动人的抒情语言写成，并运用了多种抒情方法。例如第一节头尾两段用的是直抒胸臆的抒情独白：“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然而现在呢，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子君却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感情真挚浓烈，感人肺腑。而中间两段用的是寓情于景、反复咏叹的手法。如写子君死后，涓生又回到会馆时所见到的情景：“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窗前的方桌，这样的破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这里一连用了五个“这样的”，列举六件景物，充分抒发出涓生感到景物依旧，人事已非的哀伤。

其次是细致真切的心理刻画，鲁迅是剖析灵魂的艺术大师。《伤逝》写的是一对恋人由胜利结合到悲惨离异的故事，但作者不重在事件本身的叙述，而集中刻画人物的心灵历程和感情波澜。涓生思想感情的变化主要采取心灵自剖的方法，如作品描写涓生惊闻子君死了，在心灵深处展开的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凤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这确是把涓生的悔恨和悲哀的心理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对于子君则主要是通过神态、动作尤其是眼睛的描写来刻画她的内心世界。例如描写子君答应涓生求爱的一段：“……她脸色变得青白，后来又渐渐转作绯红，——没有见过也没有再见的绯红；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然而我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这简单的几笔，十分传神地描绘了这位刚刚冲出封建牢笼的少女此时此境的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

关于《伤逝》思想和艺术的破译

再次是“手记”的形式。“手记”就是自述。《伤逝》之所以要以采用“涓生的手记”的形式，目的是增加作品的真实感，更便于运用诗一般的语言抒发涓生的悔恨和悲哀，表现出他隐微的心理活动，对他在社会矛盾和家庭矛盾面前心灵深处的种种想法进行深刻的剖析，达到诗情与深刻剖析的完美统一。因为诗情是艺术之树的花朵，没有诗情，一切艺术都不能产生强烈的美感。深刻剖析是艺术之体的筋络，没有深刻剖析，是很难造成强大的艺术力量的。《伤逝》采用“涓生的手记”形式追叙涓生与子君从恋爱同居到感情破裂以至最后子君死亡的经过，这就使浑厚沉郁的诗情和剔骨见髓的深刻心理剖析，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使作品产生了特别巨大的感人力量，不能不叫你击节赞赏。

的确，在现代小说林中，谁都不能忘却《伤逝》，不能忘却它思想的巨大穿透力和艺术的非凡感染力。甚至，下一个世纪的读者，也不会终止对它的解读和破译。